



Adam Smith in China: From Ideology to Academia

Luo Weidong

Abstract: A thorough study has been made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Adam Smith's thoughts and relevant scholar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irst of all, a brief review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es of Adam Smith's works in China since Yen Fu's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 (W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scholarship on Adam Smith's thoughts, three stages have been divid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version of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MS) as the junctures. The first stage (1949-1978) is featured by a strong color of political ideology with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greatly influenced by Marxism and the academia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s well. Smith was main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redecessors of Marxism, whos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were judged merely by the ideological standards. In the second stage (1979-1994), Smith was appealed to as the founder of free market economy fo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reform. The main focus of Chinese academia was on the work of WN,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the invisible hand" in particular. The third stage (1995-) witness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version of TMS 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appropriate acknowledgment of the moral philosopher Adam Smith. Adam Smith's mor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ideas have captur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more attempts of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Adam Smith's thoughts have been made. "Adam Smith" was once a hot topic. In this period, the contribution of Adam Smith's thoughts to social studies has been fully explored, and the image of an important figure of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s one of the innovative modern thinkers has come into being. In this paper,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P. R. China, the revival and recession of interest of Adam Smith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social thoughts and official ideologies, which has caused some widespread misunderstandings on Adam Smith's thoughts.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scholarship on Adam Smith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s, it has been concluded that a deep,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Adam Smith's thoughts has been achieved by shaking off the yok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focusing attention on the works of Adam Smith. The future would see mor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Adam Smith's thoughts and Confucian ideas, which in turn would not only deepen corresponding studies but also lead to a new direction in scholarship.

Keywords: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WN);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MS); market economy; ideology

Author: Luo Weidong earned his MA in Economics and PhD in Philosophy at Zhejiang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in 1989 and 2004. Currently he is vice Presid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Dean of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concurrently member of the Review Committee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Group,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editor-in-chief of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so on. His major interest is in theoretical economics,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research of economic ethics. His main works include *Sentiments, Order, Virtue: The Ethics of Adam Smith*;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o-author);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nti-Inflation* (co-author) and so on.

政治與學術之間：亞當·斯密形象在中國的變遷

羅衛東



[摘要]如果說從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嚴復譯介《國富論》到1949年的近半個世紀裏，亞當·斯密在中國是被作為指導西方國家走向富強之路的主要導師來看待的話，那麼，自1949年開始，亞當·斯密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治背景下，獲得了完全不同的評價，經歷了不同的形象轉換。第一個階段是1949—1978年，中國人以馬克思著作中關於亞當·斯密的論述以及蘇聯學術界關於亞當·斯密的主流認識作為指導來認識亞當·斯密，帶有十分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他被定位為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之一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是勞動價值論的

先驅。第二個階段是1979—1994年，中國學術界從市場化改革的要求出發，解讀亞當·斯密的著作，注意力集中在《國富論》一書，特別是“看不見的手”的命題，把亞當·斯密理解為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創始人和理論旗手。第三個階段是1995年至今，隨着《道德情操論》第一個中文譯本出版，中國學術界開始注意到亞當·斯密的倫理思想以及更加宏闊的社會思想，關注《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之間的關係，圍繞“亞當·斯密問題”嘗試對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進行整體性把握和理解。在這個階段，亞當·斯密思想對社會科學的一般意義逐漸被揭示出來，逐步呈現出亞當·斯密作為蘇格蘭啓蒙運動主將和近代世界最重要的總體性思想家的形象。由於亞當·斯密的思想在中國容易受到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的左右，其真實面貌一直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現，因此，近十年間中國學術界關於亞當·斯密思想的研究呈現如下趨勢：逐步擺脫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返回到亞當·斯密的文本，着重於對其真實思想的解讀，進而對亞當·斯密的認識不斷深入、全面和準確。未來中國學術界有必要聚焦於亞當·斯密思想體系與儒家人文主義的比較研究，在此基礎上深化相互之間的認識，尋求學術創新的新方向。

[關鍵詞]亞當·斯密 《國富論》 《道德情操論》 市場經濟 意識形態

[作者簡介]羅衛東，1989年、2004年在浙江大學分別獲經濟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浙江大學副校長、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社科基金理論經濟學組評審委員、《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主編等；主要從事理論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倫理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情感 秩序 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經濟思想通史》（合著）《經濟增長與反通貨膨脹的國際比較》（合著）等。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一部由嚴復（1854—1921）翻譯的名為《原富》的書在中國出版了，中國人由此知道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這個人。自那以後的一個多世紀裏，亞當·斯密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所處的位置是十分奇特的。與康德（I. Kant, 1724—1804）、休謨（D. Hume, 1711—1776）這些哲學家不同，亞當·斯密在中國一直被置於意識形態和學術的兩極之間，而且在多數時間裏，亞當·斯密的學說承載了中國人的意識形態訴求，他的純粹學術思想的價值直到最近幾年纔引起嚴肅學者們的關注。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翻譯家，嚴復曾提出過不同語言之間文本翻譯的三個標準——“信，達，雅”，但三者不是並列的，而是一種遞進關係：“信”為準確性要求，“達”為通順性要求，“雅”為優美可讀性要求。毫無疑問，準確性是第一位要求，是翻譯的生命線。然而有趣的是，按照嚴復的翻譯標準，他對亞當·斯密《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翻譯顯然是不合格的，因為，譯成中文後的內容與原書之間存在大量無法對應的地方。不能認為是嚴復本人的英文水平存在問題，更有可能的是，嚴復對《國富論》進行了自己的解讀，並將這種解讀變成了文字。實際上，《原富》已經不是一部原原本本翻譯《國富論》的作品，而是嚴復解讀後的作品。^①所以，這本書，如果作為中國人接受亞當·斯密思想最初的心態和動機的一個縮影來研究，它本身將是很有意思的思想史和觀念史課題。但本文初衷不在於此，祇是想作為切入口來討論，並且試圖闡述如下一個觀點：亞當·斯密理論在中國的命運是與這個國家的變遷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的形象也因此經歷了三次大的改變。

一 1949—1978年：勞動價值論的思想先驅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一個旨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現實的新政權。指導這個國家運行的意識形態，既有經過蘇聯人改造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又有中國革命者自己的觀念，還有一部分是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的樸素的社會秩序觀念。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最初幾年裏，從經濟計劃管理到社會控制，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蘇聯的做法為榜樣的；而且，蘇聯還派出了一大批各方面的專家作為老師和顧問到中國進行現場指導。直到1960年7月，兩國關係破裂，這些專家纔全部被撤回。

在新中國的學術事業中，蘇聯專家的影響同樣巨大。蘇聯學者的作品大量被翻譯到中國，蘇聯人被聘到新中國各類教育機構中授課、指導學生。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新中國第一代學者都是蘇聯培養起來的。他們的崛起，帶來了多重後果：首先是斯大林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全面影響了中國的學術研究，被作為指導學術事業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學術由此泛意識形態化。其次是俄語成為學者接受中國以外世界學術動向的主要語言，這意味着中國的學術研究與英語世界的信息聯繫變得困難；與此相關，在歐美國家受過學術訓練和熟悉英語文獻的學者失去了學術事務中的發言權，迅速地被邊緣化，有的甚至離開了學術領域。

雖然在中蘇兩國交惡以後，中國全面開始了去蘇聯化的過程，但是一直到1970年代末，由蘇聯人所塑造的中國學術的基本氛圍沒有根本性改變。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始終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一項工作。學術真理服從於政治需要以及滿足政治正確性的標準，幾乎是學術機構管理的通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8年底，中國推行新的管理體制時纔開始發生變化。

① 關於這個問題，可參閱皮後鋒：“《原富》的翻譯與傳播”，《漢學研究》1（2000）。該文從四個方面討論了翻譯成中文的《原富》與亞當·斯密“*The Wealth of Nations*”之間的重大差異，即結構上的差異，內容上的增刪，嚴復自己按語所表達的個人理解，以及分量上的不同。據該文所述，嚴復在《原富》一書中加了累計八萬字的按語，表達了他對亞當·斯密著作的理解和引伸；同時，他還按照自己的喜好對“*The Wealth of Nations*”進行了縮譯和刪改，有些重要術語也發生了誤譯。經他的處理，原著翻成中文祇有四十萬字左右，而後來郭大力、王亞南翻譯成《國富論》則有六十萬字之多。雖然嚴復以文言譯，用字精省一些，但核對全文，可發現嚴譯本的多處刪改和壓縮。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原富》只是“*The Wealth of Nations*”的一個編譯本和節譯本。還可參看賴建誠：《亞當·斯密與嚴復》（臺北：三民書局，2002）。

那麼，作為馬克思著作中提到的人物，亞當·斯密在1949—1978年這三十年裏，又是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呢？

在這段時間裏，受蘇聯學者特別是經濟思想史家盧森貝（Д. И. Розенберг, 1879—1950）的影響，中國學者對亞當·斯密的研究，基本上圍繞着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術史》一書中關於亞當·斯密的評論來作文章。在馬克思那裏，亞當·斯密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他是進步的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創始人，他關於價值受一般勞動決定的思想直接啓發了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3）創立勞動價值論，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的直接淵源，馬克思引以為豪的“剩餘價值學說”正是建立在經過改造的李嘉圖派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正是在亞當·斯密作為李嘉圖的學術先驅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給予亞當·斯密以一定的正面評價。另一方面，亞當·斯密的理論也開啓了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流派的源頭。這個流派通過馬爾薩斯（T. R. Malthus, 1766—1834）、薩伊（J. B. Say, 1767—1832）等人的發展成為解釋資產階級經濟活動的主要理論，即為資產階級利益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辯護的理論。而這，也是馬克思畢生要與之搏鬥的“錯誤”理論。馬克思把亞當·斯密作為一個自相矛盾的經濟學體系的創造者來看待，試圖接受其中他認為正確的東西，而拋棄和改造那些錯誤的部分。所以，在《剩餘價值學說史》這本書中，馬克思盡量按照他關於什麼是正確的經濟學理論的理解來對《國富論》進行仔細的解讀，以“亞當·斯密與生產勞動的概念”為題，馬克思用了數百頁的篇幅摘錄和評論了《國富論》的相關內容。盧森貝的《政治經濟學說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剩餘價值學說史》一書的進一步整理^①，使其具有適合於教學的結構和內容。在對亞當·斯密的研究和評價方面，它並沒有增加更多獨特的新內容。盧森貝的這本教科書在中國影響極大，可以說，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政治經濟學說史》著作和教材在很大程度上都不過是該書的翻版。

中蘇兩國交惡後，中國高等學校採用的教科書是魯友章、李宗正教授編寫的《經濟學說史》（上、下）。這是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學者編寫的第一本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經濟學說史”教科書。該書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即被當時的高等教育部定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凡開設《經濟學說史》這門課程的校、系普遍採用此書做教材，一直使用到1970年代末，先後印刷約二十萬冊之多。關於亞當·斯密的內容，集中在該書的上冊。在其他的重要閱讀材料中，比較有代表性、影響較大的，是一位資格更老、曾經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的季陶達（1904—1989）編寫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該書1960年9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以後又多次重印。它批判性地對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做了評論和介紹，其基本觀點同樣沒有脫離馬克思建立的基本框架。

嚴復所翻譯的《國富論》半文半白，給大部分青年閱讀該書帶來了困難，因此，1930年，郭大力（1905—1976）與王亞南（1901—1969）合作，將亞當·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以《國富論》為書名翻譯成白話文，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很長時間裏，這個譯本是那些不懂英語的讀者所依賴的唯一版本。1972年，商務印書館再次出版該書，目的是為當時的經濟學家研究和批判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關鍵文獻。^②

在那三十年裏，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陳岱孫（1900—1997）。他早期作為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國學習財政學，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長期任教於清華大學。新中國建立後，對大學院系進行了調整，清華大學成為單純的工科學校，陳岱孫因此到了北京大學，此後一直在該校工作。他是近代中國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也是少數幾個接受美國學術

① [蘇]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李俠公譯。

② 這次再版，書名改為英文名的全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分為上下冊出版。郭大力、王亞南在翻譯“*The Wealth of Nations*”時，還是不到三十歲、處於失業狀態的大學畢業生。兩人翻譯該書的目的，似乎是為此後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做準備。在譯出《國富論》後的一兩年時間裏，兩人又合作翻譯了李嘉圖的《賦稅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以及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等著作。

訓練而未被完全邊緣化，依然通過課堂教學和翻譯英美經濟學家著作而發揮影響的經濟學家。儘管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動盪的政治環境的干擾，但他仍然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開設經濟學說史課程，培養學生。他是一個嚴謹和優雅的學者，一生作品不多，然而在他年逾八旬的時候，卻出版了《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這部代表性作品。正是在這部書中，他梳理和評價了亞當·斯密在價值理論方面的重要特徵及其學術貢獻。從總體上看，雖然他對亞當·斯密的評論沒有超出馬克思學派的框架，但已經去除了此前類似主題所常見的激烈色彩，顯示出較為平實的特點。陳岱孫還組織了一個寫作小組，以他自己的授課講義為基礎，專門編寫了關於西方經濟學史的教科書。該書雖然直到1981年纔正式出版發行，但此前已經付諸教學，其體系和觀點較為系統和成熟。與當時正統經濟學說史教科書相比，該書表現出一種去意識形態化、去政治化的跡象，試圖扭轉當時針對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一邊倒的否定潮流。當然，它仍然帶有濃厚的馬克思學派的色彩。不過，書中關於亞當·斯密的評價似乎更加學術化、更加公允。^①

二 1979—1994年：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創作者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中國經濟政治發展的新局面。這次會議之所以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在於它試圖擺脫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政治模式，推行新的適合於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中國社會也因此呈現出巨大的活力，學術和思想的自由氛圍開始形成，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伴隨着對舊體制的反思和批評，1979年後的中國學術界顯現出了空前活躍和繁榮的景象。在這個時期，以引進市場和推動產權分散化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進展之快，使得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給與這類改革的理論支撐難以滿足實際需要，中國學術界尤其是經濟學界便轉向了其他方面。由於直接借用西方經濟學理論還存在較大的政治風險，於是首先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派尋求理論支持，一批致力於傳統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東歐學者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奧塔·錫克（O. Sik, 1919—2004）、波蘭的布魯斯（V. W. blues）、匈牙利的科爾奈（J. Kornai）的作品被介紹到中國。這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經濟學家，一直試圖從馬克思學派的作品中尋找推動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依據，但後來並沒有成功。1980年代中期，科爾奈的理論在中國風行一時，他的《短缺經濟學》在年青一代經濟學人那裏幾乎人手一冊。但與此同時，蘇聯、東歐的改革派經濟學迅速失去了中國市場。原因可能是，當科爾奈等人以不突破意識形態防線為前提建構一個基本屬於馬克思學派的改革經濟學時，遇到了難以跨越的學術鴻溝，無法滿足中國正在迅速推進的全面改革對理論的需求。

新一代中國經濟學家認識到，單純依靠傳統馬克思理論，很難尋求建設新的基於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的依據，而中國的改革又亟需價格理論和市場競爭理論。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自由主義學派的學術著作開始被大量介紹到中國。其中，既有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夫婦的暢銷書《自由選擇》（商務印書館，1982）、弗里德曼（M. Friedman, 1912—2006）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後者對亞當·斯密的推崇令人印象深刻；又有德國經濟學家艾哈德（L. W. Erhard, 1897—1977）的《來自競爭的繁榮》（商務印書館，1983）、美國激進經濟學家本傑明·羅格（Benjamin Rogge）的《資本主義能夠生存下去嗎？》（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大陸學者通過這些作品，進一步瞭解到了亞當·斯密在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提供理論支持方面所發揮的歷史作用，而中國確實需要亞當·斯密這樣為自由市場經濟進行有力辯護的人。於是，作為經濟自由主

^① 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學家對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看法，還時斷時續地受到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影響。例如，英國經濟學家米克（R. L. Meeks, 1917—1978）、多布（M. Doob）。前者關於勞動價值論研究的著作較早已被譯成中文，後者的一些關於資本主義批判和中央計劃經濟的論文也曾譯成中文，但他晚年那本影響較大的《亞當·斯密以來的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一直未有中文版。現在看來，米克和多布在斯密研究領域對中國的影響並不大。

義鼻祖的亞當·斯密，在中國又引起了新的興趣。

在推動中國關注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思想方面，哈耶克（F. A. V. Hayek, 1899—1992）是一位重要的西方學者。早在中國啓動市場化改革之前的1960年代，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就被譯成了中文。進入1980年代後，包括《自由憲章》《法律、立法與自由》《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在內的哈耶克代表性作品先後被譯成中文。其中大量涉及亞當·斯密和其他蘇格蘭啓蒙思想家的論述，也刺激中國學術界從一個新的角度，即演化的而非建構的自由主義者的眼光，去看待亞當·斯密的思想貢獻。

此後，亞當·斯密就從他作為馬克思經濟學幾個主要啓發者和思想來源創始人這一形象，逐漸被轉換到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鼓吹者和捍衛者的形象上。這是一個歷史的轉變，也使得亞當·斯密在中國不再作為勞動價值論思想的先驅受到肯定，而是作為經濟自由的旗手受到追捧。中國學者對亞當·斯密的關注開始從他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與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關係問題上，逐漸轉移到他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關係問題上來。儘管直到2002年，唐正東還出版了《從斯密到馬克思：經濟哲學方法的歷史性詮釋》（南京大學出版社）的著作，討論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方法如何從亞當·斯密、休謨、弗格森（A. Ferguson, 1723—1816）等人那裏獲得思想支撐這個問題，但現在看來這已屬於上一階段討論的餘韻了。

1989年柏林牆開放，1990年被正式拆除，不僅意味着“冷戰”時代的結束，也進一步促進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自我反思。從1990年代開始，蘇聯和東歐國家先後啓動了以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全球的局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在1989年春夏之交遭遇到了一場“政治風波”，因而在隨後三年裏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步伐明顯放緩。直到1992年春天鄧小平（1904—1997）發表了一個更大程度上推動改革的“南方談話”，為當年秋天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奠定了基礎，會議制定出了關於建立何種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如何建設等更詳細的方略。

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提出了若干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這就是如何認識自由市場體系的實際功能及其缺陷，市場體系在中國如何建設，中國將要建設的市場體制與世界其他類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有什麼共同點和特點，等等。在1990年代前半期，中國學術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經濟、商業社會的運行原理及其制度框架問題上。思想史界對亞當·斯密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他的《國富論》中有關“看不見的手”的解釋上，尤其對亞當·斯密系統表達的基於自愛的利益動機、自由交易、競爭可能增進公共福利等命題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興趣。而在1980年代以前，人們對這些命題或者根本不熟悉，或者就是簡單予以否定和批判的。當然，這種興趣總體來說並沒有導致人們將注意力轉向從亞當·斯密的著作本身尋求答案，而是集中到大批引進的英語國家新古典學派價格理論教科書上。

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學家傾向於同意如下看法：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系統化、精確化，兩者之間存在着一脈相承的關係。可以說，很少有人明白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和弗里德曼、貝克爾（G. S. Becker, 1930—2014）等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巨大差異，他們都被這一時期的中國學者看作亞當·斯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正當繼承人。由於缺乏經濟思想史的深入考察，甚至洛桑學派的瓦爾拉斯（L. Walras, 1834—1910）、帕累托（V. Pareto, 1848—1923）、巴羅內（E. Barone, 1859—1924）這些更像是中央計劃經濟支持者的經濟學家也被錯誤地作為亞當·斯密的傳人。理性人的假設加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預設，新古典學派價格理論在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中成為預設的學術配置。大學裏通行的教材和教師授課的核心是標準的新古典學派微觀經濟學，馬克思學派則被邊緣化了。其實，直到1980年代末期，許多大學還保留着《資本論》課程，但這時基本上被取消。而馬克思學派的政治經濟學，雖然一直是中國大學經濟學系的基礎課程，但到了1990年代初，這類課程的

課時量也大大壓縮，部分教師甚至在這個課程名義下講授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當然，也出現過少量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加以調和的教科書，但似乎沒有成功。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特徵在於比較靜態分析，研究的是既定前提下的資源配置問題，而歷史、制度、技術等因素對價格變化的深刻影響，常常被作為難以用經濟學分析方法把握的問題予以抽象。所以，在新古典經濟學主導中國大學經濟學系以後，政治經濟學、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也自然被冷落。其中，政治經濟學課程逐步被邊緣化為公共政治課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課程在很多大學被取消，不再設立相關的教職。在這一背景下，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開始走入低谷，亞當·斯密作為社會思想家的豐富性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被簡單地定義為是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之父。

這時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即早年在日本接受教育，明顯繼承了日本學術界亞當·斯密研究風格的老資格經濟學家朱紹文（1915—2011），開啓了另外一條真正認識亞當·斯密思想複雜性之路。朱紹文早年在日本求學時，師從東京大學的亞當·斯密研究專家大河內一男（おおこうちかずお，1905—1984）。1987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研究員的朱紹文在《經濟研究》雜誌發表了題為“《國富論》中‘經濟人’的屬性及其品德問題”一文，將一部分學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亞當·斯密關於人性的思考這個更加有意思的問題上。受該文的刺激，一直到現在，關於“經濟人”內涵、性質及其功能的研究仍然不斷出現在各類學術和非學術性雜誌上，成為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有趣的是，在十年後的1998年，朱紹文的學生樊綱在《讀書》雜誌卻發表了一篇題為“‘不道德’的經濟學”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響。文章的主題是否認經濟學理論本身與道德之間有任何聯繫，重複了實證經濟科學一直以來的說教。當然，單從文章本身不能說兩位師生之間一定存在着重大分歧，因為兩人關注的問題不一樣。朱紹文是要討論如何理解那個首先由德國人提出的著名的“亞當·斯密問題”，即斯密在《國富論》中從人的利己心出發來推論他的經濟學思想體系與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從同情心出發來推論他的社會秩序理論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矛盾，兩者該如何協調並自圓其說。朱紹文的目的是要喚起人們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理論整體性的關心，準確理解斯密理論中的交換體系的人性基礎。而樊綱所關心的是驅逐經濟分析體系中的價值判斷，保持經濟學作為純粹價值中立的分析科學的純潔性，激發了學術界尋求“何為經濟人”正確答案的濃厚興趣。

嚴格意義上講，朱紹文是中國大陸最出色而且最具有國際影響的亞當·斯密研究專家，曾代表中國參加過國際學術界關於亞當·斯密的研討會。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中。該書代表了20世紀末以前，中國學者研究亞當·斯密的最高成果。

三 1995年至今：經濟倫理主義思想的重要代表

在中國最高決策層決定帶領國家走向市場社會那一刻起，對市場經濟道德性的質疑就一直未曾停止過。最常見的一個現象是，一切非國營的廠商如果被發現有經營上的瑕疵，很快就會招致社會輿論對唯利是圖的商人階層敗德行爲的猛烈批評，並且加深人們對市場經濟的疑慮。

正是在這一社會狀況下，1995年前後，中國學術界舉辦了多場以市場經濟的道德性或者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但是，這些研討會多數是由非經濟學家組織和參與的。因為，在經濟學界，祇有少數有人文主義傾向的學者對此有興趣。比如，汪丁丁教授就曾經在《改革》雜誌1995年第5期發表《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一文，重點論述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一個具有基本道德品質的（自利而非自私）的行爲主體。他援引了中國古代的儒家關於“德性”的討論以及對亞當·斯密自利人的新理解來支持他的論點。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反響；但這種反響主要來自經濟學以外的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以及一部分對新古典經濟學持懷疑批評態度的經濟學家。

1997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這一年，浙江大學的蔣自強教授與其他三位學者合作翻譯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將亞當·斯密生前多次審定的得意之作翻譯成中文。蔣自強還為這個譯本撰寫了長篇序言，重點討論了《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關係，尤其是試圖對經濟人的利己心與利他心之間的矛盾關係作出解釋。“序言”強調，亞當·斯密兩部主要著作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雖然其論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就本質而言是一致的。主要理由是：（1）兩者研究、寫作、修訂是交替進行的，有着互相關聯的問題意識和思想脈絡；（2）兩者對人的行為動機的分析，都是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的；（3）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繫還集中體現在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統一論述之中。因此，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祇是後人誤解了其著作而產生的。^①在他與何樟勇合作的論文中，又對這一主題作了進一步闡述。^②

《道德情操論》中文本的出版發行，不僅對中國學者的亞當·斯密研究，而且對中國公眾瞭解和認識亞當·斯密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啟動了中國研究亞當·斯密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特點是，此前中國學者專注於《國富論》中的亞當·斯密，此後則開始關注《道德情操論》中的亞當·斯密。很長時間裏，由於受到語言能力、學術信息閉塞等方面的限制，中國學者其實沒有接觸過《道德情操論》的文本，有的甚至從未瞭解亞當·斯密曾經有這樣一部講道德哲學的書，因此當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出版後，引起很多人的訝異。其實，北京大學的周輔成（1911—2009）教授在他主編的《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下，商務印書館，1964）中，曾經選譯了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的部分章節，但該書的影響僅限於哲學界，經濟學界很少有人知道。

在此後的十多年時間裏，《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的關係，以及亞當·斯密的人性觀、道德哲學體系等問題，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

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關注，本質上還是中國社會在啟動全面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過程中，民眾對全面商業化社會的道德前景所抱有的懷疑和恐慌。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市場經濟道德性的深刻懷疑，一方面源自中國數千年歷史傳統中以家族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實施倫理本位的秩序安排，倫理關係的重要性被置於一切社會事務和個人事務之上。社會職業的尊卑貴賤也以“士、農、工、商”的順序排列，企業主和商人在道德上不如士人和農民可靠。對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工商業主道德品行的懷疑，即使市場經濟觀念已經在中國社會得到鞏固的今天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另一方面，馬克思學派向來提醒人們，警惕私有財產和物質利益對人類道德性的損害，並主張通過建立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新制度來消除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對人類自由的損害。這兩種觀念在反市場方面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的。

從1995—2006年這十餘年間，中國學者在研究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以及如何正確理解《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關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首先，王瑩、景楓的《經濟學家的道德追問：亞當·斯密倫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和聶文軍的《亞當·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分別於2001年和2004年出版。這兩部作品都是從倫理學角度梳理亞當·斯密思想的綜述性作品，對於引起中國學術界形成亞當·斯密作為道德哲學家的認識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其次，羅衛東於2006年出版了《情感 秩序 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書。該書借鑒了國際上亞當·斯密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田中正司（たなか しょうじ）、水田洋（みづた ひろし）等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對《道德情操論》各個版本進一步做了文獻學意義上的梳理，較為深入地解讀了《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及其在亞當·斯密去世前三十年裏所發生的緩慢變化，揭示斯密道德哲學體系內部存在的緊

① 1976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拉斐爾（D. D. Raphael）、梅茜（A. L. Macie）編輯的《道德情操論》的最新版本，但蔣自強教授等翻譯的《道德情操論》所依據的仍然是倫敦1833年版本。

② 蔣自強、何樟勇：“簡論‘經濟人’的約束機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1998）：84—90。

張以及亞當·斯密本人為消除這種緊張所做的大量嘗試。該書同時也提示，斯密道德哲學與中國先秦儒家道德哲學之間具有某種相似性的方面，但可惜未作進一步展開。

由於“同情心”是亞當·斯密道德哲學中的關鍵概念，中國學者對此也有較多的討論。其中兩個迹象值得關注：一是把亞當·斯密的“同情心”概念與中國古代儒家哲學中的“仁”概念進行比較。這除了杜維明教授很早就提出亞當·斯密與中國儒家之間關係的命題外，浙江大學2005年還在杭州舉辦過題為“亞當·斯密與中國”的研討會。在會上，大家圍繞亞當·斯密的思想與中國儒家的“仁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進行了討論，其中有學者提出了亞當·斯密也許在遊學法國期間通過重農學派的介紹接觸到了孔孟思想。之後，耿寧、陳立勝在《世界哲學》雜誌2011年第1期發表題為“孟子、斯密與胡塞爾論同情與良知”、周國正在《清華學報》（台灣）2013年第3期發表題為“人我間道德同感的參照起點——孔子的‘己’與亞當·斯密的旁觀者”的論文，對“同情心”與孟子“性善論”、孔子“己”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對比。這反映出，中國學者嘗試用儒家等中國自身傳統中的思想資源對亞當·斯密進行再解釋的傾向性不斷增強，值得西方學術界關注。另一迹象是，一些學者試圖採用還原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方式處理“同情心”概念。隨着腦科學越來越多地進入到社會科學，基於神經元機制的社會研究開始在中國興起，因此，若干研究運用核磁共振設備來尋找同情心的神經元基礎，這以葉航等人為代表^①。還有一些學者延續了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式，試圖通過受控行為實驗來尋找基於人類本性的社會行為的規律。例如，王志堅、許彬率領的團隊發表了數十篇工作論文。

從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入手，部分中國學者開始注意亞當·斯密作為其重要代表人物的蘇格蘭啟蒙思想，試圖通過思想史的考察，在歷史情境、文化觀念、學者的思想發展這三者之間尋求聯繫。從2006年始，羅衛東等學者組織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研究的年度研討會，每年一次，每次圍繞一個主題或概念進行研討。與此同時，中國學者還深入到了斯密與自然法傳統、斯密與神學、斯密與語言學和修辭學等層面，發表了相關的論文；浙江大學出版社也組織了此前在中國不受關注的蘇格蘭啟蒙學者作品的翻譯出版，如哈孔森的《立法者的科學：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自然法理學》、洪特和伊格拉提夫主編的《財富與德性：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政治經濟學傳統》等。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很多學者轉向了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關注，但在經濟學界，仍然有人對亞當·斯密著作中的若干主題進行研究，這些主題包括分工、資本、貨幣、貿易、收入分配、國家稅收、經濟史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者對斯密分工理論及其應用於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問題的若干成果。例如，楊小凱（1948—2004，後來加入澳大利亞國籍）發展了斯密—楊格定理，建立了超邊際分析經濟學派，並試圖重新表達基於分工的新經濟增長理論，以取代佔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②韋森嘗試運用亞當·斯密提供的概念，對一國長期增長的動力及其限度問題進行描述^③，等等。

除了道德哲學和經濟學以外，關於亞當·斯密還涉及其他領域的討論，如社會學、政府管理、教育改革、軍事學、法學、社會組織、合作社、歷史觀等；不過，與道德哲學和經濟學的討論相比，這些方面的論文數量要少很多。

總起來看，1995年至今的二十年時間裏，在社會經濟思想和政策領域，亞當·斯密作為一個西方思想家在中國所具有的影響力是空前的，而且與其他西方思想家相比，其影響也是獨樹一幟的。部分原因在於，此前弗里德曼、哈耶克、科斯（R. H. Coase, 1910—2013）等學者的思想較大地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其共同的前輩亞當·斯密自然而然地也被引起關注。而且，亞當·斯密的很多重要作品，特別是《道德情操論》等都是在這個時期首次翻譯成中文，被廣泛地閱讀。但

① 葉航：“利他行為的經濟學解釋”，《經濟學家》3（2005）：22—28。

② 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③ 韋森：《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探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道德基礎、文化環境與制度條件》（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是，斯密的巨大影響的根本原因還在於這個時期的中國在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中，無論是個體的經濟觀念、行為依據的確立，還是國家經濟制度和政策的設計，都遇到了很多困難和問題，這些困難和問題並不能通過簡單地模仿美國等成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需要中國人自己進行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討論。而中國人發現，亞當·斯密的作品，無論是《道德情操論》還是《國富論》，對於理解這些困難和問題都有一定的針對性，可以提供某些迫切需要的指導。可以說，這個時期，亞當·斯密在中國獲得了高度的尊重和重視。

四 亞當·斯密未來形象之展望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影響中國人認識和接受亞當·斯密形象的因素，主要是國家本位的、具有特殊歷史要求的、意識形態的、基於現實和具體需求的，而不是基於哲學的、人性的、面向普遍的啓蒙使命的。因此，亞當·斯密的形象，在不同年代、不同政治條件下，不斷地變化着，讓人們不得要領。總括起來說，在嚴復譯介《國富論》到1949年的近半個世紀裏，亞當·斯密在中國是被作為指導西方國家走向富強之路的主要導師來看待的。自1949年開始，亞當·斯密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治背景下，獲得了完全不同的評價，經歷了不同的形象轉換。在改革開放之前，他被定義為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之一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是勞動價值論的先驅；而進入改革開放後的最初十餘年，他又被當作自由放任主義的先驅，是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創立者；最近十多年來，他越來越被當作一個經濟倫理主義思想的重要代表。其實，亞當·斯密這三副面孔，都起因於中國社會變遷的三種基本訴求，是中國人根據自己的需要所進行的簡單而片面的解讀而形成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一批年輕學者的努力，亞當·斯密作為啓蒙主義者以及現代社會科學家的這一更加具有綜合性的形象開始被人們所重視，他作為思想家的真正貢獻也日益被中國人認識到。

要對亞當·斯密在未來中國的形象和命運做出預判，不太容易。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待：

首先，從未來一個時期的重大學術需求看，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力量。

一方面，西方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已經過了最繁榮的時代，中國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自身文化傳統以及思想資源的復興，這看起來會削弱中國知識界對亞當·斯密思想的繼續關注；另一方面，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速度在加快，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在不斷加強，同時中國政府推進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的力量也在加強，這又會刺激亞當·斯密思想在中國的應用。因此，亞當·斯密在未來中國的形象，亞當·斯密思想在未來中國的命運，就取決於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其次，亞當·斯密在中國的形象和命運，還取決於他的思想能否被中國學者全面而準確地加以解讀。

無疑，亞當·斯密思想對於未來中國而言，仍然有其現實層面的意義。比如，他對重商主義的批評，為自由市場體系進行的經典辯護，對私人壟斷企業的譴責等等，在中國今後相當長時間裏仍是有針對性和有效力的。尤其是他關於人性本源方面與現實方面的綜合考察，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道德哲學體系以及他的歷史觀，對於中國未來的總體轉型和發展而言是更加重要的思想資源，相信中國學術界會越來越立足於自身哲學體系的支點來討論亞當·斯密。例如，通過中國儒家的人文主義、道家的秩序論、佛家的超越觀等視角，重新審視亞當·斯密的思想；特別是“儒家人文主義與亞當·斯密主義”這個主題，有望成為連接古今和中西的一條關鍵思想紐帶。又如，還可以從亞當·斯密那裏，尋找推動未來經濟學革新的思想資源。

[作者註：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浙江師範大學張亞萍博士、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程晨在收集文獻資料方面提供了重要幫助，特此致謝。]